

刘勰的家世生平和著作

顾 农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3300)

摘要: 刘勰出身于一个逐渐衰败的世族高门, 东莞刘氏在萧齐时代严重衰落, 入梁后稍有转机。刘勰的不婚娶既表明他家族的衰败, 也表明他不甘于婚姻“失类”。刘勰依僧祐研究佛学则既有思想学术上的原因, 也不无“托附”方面的考虑。他除了用本名写过若干与佛教有关的文章以外, 还为僧祐代笔写了不少东西。刘勰的专著有《刘子》和《文心雕龙》, 前者的著作权有争议, 但其中的立言与刘勰有着密切的关系; 后者自是伟大的文学理论名著, 而其书名则表现了他的佛学修养。

关键词: 刘勰; 家世; 生平; 《刘子》; 《文心雕龙》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331(2009)02-0005-06

收稿日期: 2008-12-06

作者简介: 顾农(1944—)男, 江苏泰州人,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465? ~ 521?)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一位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伟大人物, 可惜关于他的家世和生平, 现在所能知道的并不甚多。据《梁书》本传及《宋书·刘穆之传》他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汉的齐悼惠王刘肥, 家族中的近代名流则有刘宋的开国重臣刘穆之、司空刘秀之等; 但他本人所在这一支则比较弱, 祖父刘灵真似无名位, 父亲刘尚也只做到越骑校尉, 到刘勰时代则更为衰败萧条。所以, 刘勰虽出身于东莞刘氏这样的士族高门, 而到他这一代简直同寒门相当靠近了。

在南朝, 士、庶的界限相当严格, 但其间也有变迁, 破落已久的士族有时候就会被在位的高官斥为寒士, 典型的例子如东晋的杨佺期, 其人乃是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 “白云门户承籍, 江表莫比, 有以其门第比王珣者, 犹恚恨; 而时人以其晚过江, 婚宦失类, 每排抑之”(《晋书·杨佺期传》)。弘农杨氏衰败已久, 到这时更进一步式微了。《晋书·桓玄传》称“佺期为人骄悍, 常自谓承籍华胄, 江表莫比; 而(桓)玄每以寒士裁之, 佺期甚憾。”长

期衰落的士族就这样被人们看成了寒门。学术界有一派颇具权威的意见, 认为刘勰出身庶族^{[1](P-26)}, 笔者不敢同意, 就是出于对那时实际情况的上述考量。

东晋南朝的士族高门一般来说是在魏晋时代的政局动荡中新兴起来的, 这些家族的厉害之处在此后不断推出人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住了该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巨大优势, 基本上不受时局变化、朝代改换的影响。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等家族就是如此。这种情形到齐梁时代虽然有了一些变化, 但基本格局未变, 如琅琊王氏仍然立于不败之地, 沈约曾经感慨地说过“吾少好百家之言, 身为四代之史, 自开辟以来, 未有爵位蝉联, 文才相继, 如王氏之盛者也”(《梁书·王筠传》)。东莞刘氏当然不能与琅琊王氏相比, 但也还能维持住某种家族的优势。刘勰之高祖有好几个儿子, 其中的刘爽有一个孙子名叫刘岱(刘勰的堂叔), 他的墓志于 1969 年在江苏句容出土, 完好无缺, 后来发表在《文物》1977 年第 6 期上。从这份墓志中人们得知, 刘岱的高祖刘抚官至彭城内史, 曾祖刘爽为山阴令, 祖父刘

仲道(按即刘灵真之父,刘勰之曾祖)为余姚令,父刘粹之为大中大夫,刘岱本人则是山阴令。从这一可靠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东莞刘氏的这一支到齐代(刘岱死于永明五年)尚能维持其宗风不坠。

一般来说,一个士族家族想要维持其传统的优越地位,必须不断地推出人才,在官爵和文才两个方面保持其优势地位。语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战国策·赵策》),后代子孙想完全凭借高贵的血统过日子,即使在中古时代也是行不通的。但是要做到在多少代当中始终人才辈出,并且有适当的机遇,很不容易;不少家族因为政治或其他原因衰败下去,他们的后裔往往被人看不起,甚至像杨佺期那样被斥为寒士就是典型的一例。刘勰家族中的某些分支不幸而正是如此。《南史·刘详传》载,刘穆之的曾孙刘详(刘勰的堂兄弟)“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齐建元中,为正员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详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褚渊(彦回)斥刘详为“寒士”,便十分触目地表现出对于业已衰落的刘家这一支派的藐视。刘详与刘勰为同宗兄弟行。褚渊自高自大,曾经不止一次地斥责士族衰门为“寒士”,《南史·谢灵运传》载:

司徒褚彦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阁道坏,坠水,仆射王俭惊跳下车。谢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坠车仆射。”彦回出水,霑湿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抗声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彦回大怒曰:“寒士不逊!”

谢超宗(?~483)是谢灵运的孙子,本人极富于才华,但陈郡谢氏自从灵运被杀后迅速衰落,以致其子孙也被得势的权贵所轻视。

东莞刘氏的地位本不足与赫赫有名的陈郡谢氏相提并论,但在刘宋时一度颇盛。在西晋末年渡江南下的中原冠带百家之中,最显赫的是王、谢、萧、袁诸家^①,东莞刘氏不与焉;可是刘氏分支中刘穆之这一支甚强,机遇也比较好,穆之本人为刘宋佐国元勋,封南康郑公;其长子虑之官至员外散骑常侍,中子式之为黄门侍郎,少子贞之为中书黄门侍郎,都位居清要。刘仲道—刘秀之这一支

也还比较强,而到刘灵真—刘尚亦即刘勰的祖父和父亲这一分支便相形见绌了,在萧齐时代趋于衰落。整个东莞刘氏在萧齐一代都呈现衰败之势^②。

二

关于刘勰本人的生平经历,《梁书》有一份比较简单的传,开头部分有云:

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

早孤使刘勰失去依靠,估计他想与士族高门攀亲已经相当困难,而高贵的出身也使得他不愿意随便婚娶以至于失类,于是只好当他的单身贵族。

关于刘勰何以入建康定林寺依沙门僧祐,或谓是为了避免租课徭役,其实刘勰虽然早孤,但作为已故越骑校尉(秩二千石,官居四品)的儿子,他是享受特权无须纳课服役的;估计他依僧祐是为了研究学问特别是佛学,同时可能也有通过僧祐之助进入仕途之意,这一点不妨留到后面再说。

总而言之,刘勰可以说是一个破落户的子弟。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文坛上历来有两大类子弟:破落户和暴发户,尤以破落户子弟为多:“要说专仗笔墨的作者,首先还得求之于破落户中。他先世也许暴发过,但现在文雅胜于算盘,家景大不如意了,然而又因此看见世态的炎凉,人生的苦乐,于是真有些抚今追昔,‘缠绵悱恻’起来。……然而破落户到了破落不堪的时候,这两户却有时可以交融起来。如果谁有在找‘词汇’的《文选》大可以查一查,我记得里面就有一篇弹文,所弹的乃是一个破落的世家,把女儿嫁给了暴发而冒充世家的满家子;这就足见两户的怎样反拨,也怎样的联合了。”^{[2] (1341-343)}刘勰的故家尚未破落到沈约所弹的东海王源家那种地步^③,他本人进入寺院研究佛教经典尚不失为一条暂时可行的出路。

梁王朝建立以后,刘勰进入仕途,但转了很大的一个圈子以后,最后又回到了定林寺,晚年出家,并死在那里。《梁书》本传记录了他简单的

① 《新唐书·柳冲传》:“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

② 《南史·刘秀之传》:“传封至孙,齐受禅,国除。”是秀之一脉入齐后亦已衰落。刘穆之的后代如刘详已被视为寒士,如上文所述。

③ 详见《文选》卷四十《奏弹王源》。

履历:

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七庙饷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

初,刘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其序曰……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盛贵,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

萧梁代齐之后,刘勰进入仕途,他先是充当没有实际职务的“奉朝请”,很快就成为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据《梁书》本传,萧宏进号中军将军在天监三年(504),六年(507)夏迁骠骑将军,然则刘勰到他手下专掌文翰当在此数年之内。天监七八年间,刘勰参与梁武帝萧衍敕撰之《众经要抄》的编纂事宜,佛教史著作仍称之为“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续高僧传》卷五《僧旻传》);大约就在《众经要抄》事毕之后,刘勰“迁车骑仓曹参军”。他担任太末(今浙江衢县)令大约在天监十年前,而除仁威将军、南康王萧绩之记室当在天监十年至十六年之间。刘勰何时兼东宫通事舍人一职也很难确知,查萧绩(萧衍第四子,萧统之异母弟)进号仁威将军时,为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其人不在首都;到天监十六年(517)萧绩“征为宣毅将军,领石头戍军”(《梁书》本传),刘勰兼东宫职事,很可能就在这一年。

通事舍人一职掌呈奏案章,按照惯例“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梁书·庾於陵传》),刘勰能得到这个职务显然十分兴奋,于是在第二年上表言事,建议南北郊祀不用牺牲,专用蔬菜水果,这一建议深刻地符合萧衍的崇佛政策,所以立即“诏付尚书

议,依勰所陈”。刘勰在政坛上终于崭露头角,很快升迁为步兵校尉——任此职者多为名流——并兼舍人如故。

刘勰在萧统东宫大约前后十五年,时间应当说很长了,但他有许多工夫花在佛教的活动方面。他与萧统的关系大约不算密切,萧统最欣赏的文人是刘孝绰、王筠等人,刘勰没有进入那个核心的小圈子。^[3]

到中大通三年(531)萧统去世,萧衍没有立萧统的子嗣为皇太孙,而另立萧统之弟萧纲,于是东宫的属官实行大换班,只留下一个通事舍人刘杳,其余一律散去^①。刘勰走投无路,奉敕与沙门慧震在定林寺撰经,稍后他就在这里出家,很快就在这里去世。刘勰在官场和宫廷奋斗求索了三十年,最后又回到了他青年时代长期生活过的定林寺,回到了他的精神导师僧祐的根据地,这大约是他始料所不及也未必心甘情愿的吧。

三

僧祐(445~518)乃是齐梁时代极负盛名的高僧,他是齐高帝敕封之僧主法颖的高足,又从律学宗师、曾亲自赴西域求过经像的法显问学,很早就成为一代大师。永明间竟陵王萧子良曾经多次请他讲律,听众多至七八百人。僧祐又曾经奉齐武帝之命往三吴(今江苏镇江以东一带)简阅僧尼,俨然佛教界的领袖之一。萧梁代兴以后,梁武帝萧衍对他也极其尊重,凡于僧事有疑难都请他审议决定。临川王萧宏对他尤为尊重。天监九年(510)出现了以头陀道人妙光为首的附佛外道(邪教),萧衍即请僧正慧超和僧祐等名德出来审理此案,论罪定刑^②。僧祐又精通佛教的造像,许多大的造像工程多由他监造,更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刘勰追随于这样一位大师之后,在定林寺长期研修,后来成了著名的佛教学者和文章高手。《梁书》本传说,刘勰在僧祐那里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又说“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杨明照先生引证《高僧传·释

^① 《梁书·文学传》:“昭明太子薨,官属罢。”“昭明太子薨,新宫建,旧人例无停者,特敕留(刘)杳焉。”

^② 详见《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第四·〈萨婆若陀耆属庄严经〉》。

僧祐传》并进而指出：“舍人依居僧祐，博通经论，别序部类，疑在齐永明中僧祐入吴试简五众，宣讲十诵，造立经藏，抽校卷轴之时。僧祐使人抄撰诸书，由今存文笔验之，恐多为舍人捉刀”^{[4] (B93)}。这里之所谓诸书，就是指《出三藏记集》、《弘明集》、《释迦谱》、《法苑杂缘原始集》、《世界记》等等。

僧祐在刘勰的帮助以至代为执笔的情况下完成的著作已有相当一部分亡佚，但《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弘明集》十四卷和《释迦谱》五卷还可以完整地看到。

其中最为重要的《出三藏记集》是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录，全书分四个部分：其一，缘记，简要地叙述佛教典籍的结集和传入中国的过程。其二，名录，这里继承并发展了释道安《综理众经目录》的传统，用一种特殊的富于创意的目录学方法将东汉以来中土所译的佛经（凡二千一百多部，四千三百多卷）作了综合的记录和述评，先按佛典译出的时间先后来排列，再按译者来分类，这就是所谓“沿波讨源”，史的意识非常之强。本书的记录十分精细，除了按时代记录译者译经之外，还兼及各地失译经、疑经、注经等方面，并注意记载同一经典的复译本、抄经、伪经等等，分别注明其存佚。其三，经序，搜集译本佛教经书的序目、后记一百二十篇，保存了大量的重要资料。其四，列传，为佛经翻译家以及有关佛教学者三十二人（其中外国二十二人，中国十人）立传。总之，全书框架宏伟，头绪分明，以译经为中心，熔佛经目录、译经文献与译者传记于一炉，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出三藏记集》撰录于齐明帝建武年间^①，入梁后继续有所增补^②，书中记载佛教经典诸事最晚的到天监十六年（517）^③。

刘勰参加了此书的编撰，据日本学者兴膳宏的研究，从运用词汇的习惯这一角度看，《出三藏记集》的序言和书中若干篇章当出于刘勰的手笔；全书常用的以名数统事理的方式，在《文心雕龙》中也往往可以看到^{[5] (H7-42)}。这些都表明两书的作者为同一人。刘勰参加此书的编撰，一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方面也得到锻炼，提高了处理复杂的研究对象的能力。《文心雕龙》一书的撰写年代与《出三藏记集》部分重叠，前者书中很少

运用佛教词汇也许可以由此得到解释：他是把这两部书分档处理的。

除了帮助僧祐著书编书以外，刘勰也曾用自己的名义写了不少文章，所制之寺塔及名僧碑志甚多，由于他本人的文集亡佚，这一类文章也大部分失传了，例如《高僧传·释超辩传》载：“以齐永明十年终于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门僧祐为造碑墓所，东莞刘勰制文。”《高僧传·释僧柔传》载延兴元年（494）僧柔去世以后，也是僧祐“为立墓碑所，东莞刘勰制文”。这两篇碑志文今已失传。天监十七年（518）僧祐圆寂，墓碑也是刘勰撰写的，亦已失传。刘勰所作的《钟山定林上寺碑铭》、《建初寺初创碑铭》^④等等也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所能看到的直接署名刘勰的文章只有两篇：《灭惑论》（《弘明集》卷八）、《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会稽掇英总集》卷十六）。

《灭惑论》是刘勰现存唯一的一篇佛学论文，它是针对当时的道士冒用齐代名士张融的名义杜撰的《三破论》而发的。《三破论》强烈地反佛，指出佛教危害极大，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佛教是“羌胡”异族的宗教，不合中国国情。刘勰的文章则痛驳此论，指出佛教不知道要比道教高明多少，而且尽管佛教是由异国传入中国的，但这一点并不足以成为信仰它的障碍，因为中外的道理是一样的：

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佛之至也，则空玄无形，而万象并应；寂灭无心，而玄智弥照。幽数潜会，莫见其极；冥功日用，靡识其然。但言万象既生，假名遂立，梵音菩提，汉语曰道……权教无方，不以道俗乖应；妙化无外，岂以华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东西，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陶铸群

①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五载：“《出三藏集记》齐建武年律师僧祐撰。”

② 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十亦载《出三藏记集》并云“齐末梁初沙门释僧祐撰”。

③ 本书卷八《解大品经序》注云：“此经东渐二百五十有八岁，始于魏甘露五年至自于阗。”由甘露五年（260）下数258年，为天监十六年（517）。

④ 僧祐在《法集杂记目录序》一文中提到刘勰的这两篇碑铭以及《僧柔法师碑铭》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

生,无异也。

这一段话代表刘勰的基本思想。他有当时最广阔的胸怀和眼光,看出了异质文化之间有着相通的东西,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外来宗教的佛教具有同样的价值。认清刘勰这一思路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他既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又那样五体投地地崇拜孔夫子;为什么他既写了那么多佛教文章,又写了儒家气息极其浓厚的《文心雕龙》。这种看起来很奇怪的情况在刘勰那里是完全一致、理所当然的。

《灭惑论》写于何时,是在《文心雕龙》之前还是其后?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材料能够说明,因此有很大的争议^①,其实这个史料考辨问题即使无法解决也无妨,因为这一文一书都是刘勰思想业已成熟以后的产物,其间并无原则的差别,只不过因为具体的任务不同,论述遂各有侧重而已。

剡山石城寺造像是当年非常著名的佛教大工程,早在齐永明四年(486)僧护经过剡县(今浙江新昌)隐岳寺,见其北有十数丈高的青壁,认为具有雕刻巨型佛像的良好条件,遂发愿造像,未成而卒。后有僧淑继承他的遗志,继续造像,仍然没有完成。到梁天监十二年(513)建安王萧伟(梁武帝萧衍的八弟,天监元年封建安郡王,十七年改封南平郡王)为了给自己消灾去病,重新开始这一工程,请僧祐监造,至天监十五年(516)大功告成。僧祐将原先所凿之龛加高加深,在此中刻成一尊高十丈的弥勒巨佛^②,龛前有三层台,并造门殿殿堂。整个工程气势极为雄伟,成为一代的盛事。刘勰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用大量的篇幅叙述石城山造像的始末,歌颂大梁王朝“道铸域中”的盛德和萧伟弘扬佛法的“茂绩”,文字华丽典重,与当时一般歌功颂德的文章大体相近,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关于僧祐的一段文字:

……以定林上寺祐律师德炽释门,名盖净众,虚心宏道,忘己济物,加以贞鉴特达,研虑精深,乃延请东行,凭委经始,爰至启敕,专任像事。律师应法若流,宣化如渴,扬船浙水,驰锡禹山。于是扞虚梯汉,构立栈道。状奇肱之飞车,类仙腹之悬阁。高张图范,冠彩虹霓。椎凿响于霞上,剖石洒乎云表。命世之壮观,旷代之鸿作也。初护公所鑿,失在浮

浅,乃铲入五丈,改造顶髻。事虽因旧,功实创新。乃崖窟既通,律师重履,方精成像躯,妙量尺度。时寺僧慧逞,梦黑衣大神,翼从风雨,立于龛侧,高略分数。是夜将旦,大风果起,拔木十围,压坏匠屋,师役数十,安寝无伤。比及诘朝,而律师已至。灵应之奇,类皆如此。

把僧祐形容得神乎其神,由此颇可考见他们师弟之间亲密的关系。碑文骈散兼施,凡叙事的部分,散句比较多,因为这些地方用骈偶的句子不容易说清楚,例如叙述建安王萧伟决定重新开工、终于建成的经过:

以大梁天监十有二年,岁次鹑尾,二月十二日开凿爰始,到十有五年,龙集涪滩,三月十五日,妆画云毕。像身坐高五丈,若立形,足至顶十丈,圆光四丈,座轮一丈五尺,从地随龛,光焰通高十丈。自涅槃已后,一百余年,摩竭提国始制石像,阿育轮王善容罗汉,检其所造,各止六丈。鸿姿巨相,兴我皇时,自非君王愿力之至,如来道应之深,岂能成不世之宝,建无等之业哉!

叙事简而得要,足见他散文的水平。写这篇碑文的时候刘勰已经进入仕途十多年了,但他与佛教界的联系还是如此密切。

四

在这些零零散散的文章之外,刘勰还有一部大著作《刘子》(一称《新论》或《刘子新论》)又有《流子》、《德言》等异称,此书为《梁书》本传所未载,《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著录十卷,指明其书出于梁,已亡,未署作者为何许人。但此书其实未亡,《旧唐书·经籍志》丙部杂家类著录十卷,明确地记载其作者为刘勰。后来的官私目录多有著录,传世之抄本(最早者为敦煌写本,写成于六朝之末或隋),刻本甚多。刻本之最早者为小字残宋刻本,题“梁通事舍人刘勰撰,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注”。《四库全书》亦收入此书。今人有《刘子

^① 杨明照先生认为此论作于齐永明间,早于《文心雕龙》,详见《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03页;王元化先生认为此论作于梁,在《文心雕龙》之后,并据此来讨论刘勰前后思想的变化,详见《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2页。

^② 《会稽掇英总集》卷十九有僧辨端《新昌县石城山大佛身量记》,详细记载了这尊巨佛的有关数据,据说佛头就有一丈八尺见方。

校注》(杨明照撰,巴蜀书社 1988年版)、《刘子集校》(林其鏊、陈金凤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集其大成,便于取读。

关于《刘子》一书的作者,向有不同的说法,除刘勰之外,又有北齐刘昼、汉刘歆、梁刘孝标、唐袁孝政诸说,而刘昼最为重要。唐宋时已有人认为作者应当是刘昼。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引用袁孝政《刘子注序》即认为是北齐刘昼撰,“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刘歆、刘孝标作。”刘克庄《后村诗话》引《朝野僉载》则称此书为刘昼冒用刘勰的名义所作。《刘子》一书的著作权从此成了一个問題,至今未能论定。但《隋志》是以阮孝绪《七录》为依据的,《七录》成书于梁普通四年(523),其时刘昼尚幼,不可能写这么一部大书,所以我们赞成王重民^①、林其鏊、陈金凤^②等学者的意见,确认此书为刘勰的著作。

《刘子》一书内容极其丰富,仅就反映刘勰本人的心态这一点而言,其中就已经提供了非常值得注意而且读起来极有兴味的材料。例如《刘子》第四篇《韬光》写道:

物之寓世,未尝不韬形灭影,隐质遐外以全性栖命者也。夫含奇佩美、炫异露才者,未有不以此伤性毁命者也……

周鸡断尾,获免牺牲,山狙见巧,终必遭害。由此言之,则出处之理,亦可知矣。

刘勰本人终齐之世未尝出山,一味躲在定林寺里精研佛教典籍,是不是也有一点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意思呢?又该书第二十一篇《托附》有云:

夫含气庶品,未有不托附物势以成其便者也……附得其所,则重不可浮,短翅能远;附失其所,则轻羽沦溺,迅足成蹇。

刘勰背负所著之《文心雕龙》手稿以干沈约,大有托附物势之意其实就是依附僧祐,又何尝没有托附之以成其便的味道?既讲韬光养晦,又讲托附物势,看似矛盾,其实相反相成,这里有一个时机问题,“屈伸在遇”(《刘子·通塞》),时机未到,姑且韬晦以待,时机一到,当托附合适的对象,振翅高飞。刘勰虽精研佛法,而其内心深处与一般士人固无所异也。

刘勰传世之作中之最重要者当然是他的《文心雕龙》。此书的写作年代,据清人刘毓崧的考证,当在齐末和帝时(501~502);范文澜先生进而推定在齐明帝建武三四年间(496~497);近人又有认为当在东昏侯永元元年(499)者。这样一部大书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统而言之曰成书于齐末,反而会因为提法模糊而显得准确。我们看《文心雕龙》评论作家作品基本上迄于东晋,刘宋时代的情形亦偶有涉及(如《明诗》、《通变》、《指瑕》、《才略》诸篇),而称齐代为“皇齐”,不作任何具体的批评,采取回避的态度,便可以知道此书当作于齐代。但此书中也有梁代的痕迹,例如避讳“衍”字^③,估计这是入梁以后刘勰作了改动;这并不影响此书撰写于齐末的基本事实。

刘勰以“文心”为书名的前半,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承传,也受到佛教经典的启示。《文心雕龙·序志》云:“夫文心者,言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涓子就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提到的环渊,他是老子的弟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其书十三篇,属于道家;《汉志》又著录属于儒家的《王孙子》一篇,注明一曰《巧心》。二书均早已亡佚,《太平御览》卷六七〇引《集仙录》云:“涓子,齐人也,饵术,著《三才经》,淮南王刘安得其文,不解其旨。又著琴书三篇,甚有条理。”所谓琴书大约即指其《琴心》。近年来出土之郭店楚简中透露出了一些与涓子有关的信息^④,但仍然不够清晰。佛教典籍中关于“心”字说得很多,东晋高僧慧远与西域僧人僧迦提婆共同译出《阿毗昙心论》,慧远在译本序言中写道:“《阿毗昙心》者,三藏之要颂,咏歌之微言,管统众经,领其宗会,故作者以‘心’为名焉。”可知佛教以“心”为根本;然则文心就是文之根本,刘勰正是要从根本上来讨论文的问题。

“雕龙”则表明刘勰对于美的追求,《序志》篇说:“古来文章,以雕缚成体。(下转第15页)”

① 《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182、186、218页。

② 《刘子作者考辨》载《刘子集校》一书之末;又《再论刘子作者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期。

③ 《时序》:“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按大衍之数五十,这里特别改称“大易”,明显地避萧衍的名讳。又书中提到前代作家邹衍、冯衍、王衍时一律避用“衍”字,都决不是偶然的。

④ 详见饶宗颐《涓子〈琴心〉考——由郭店雅琴谈老子门人的琴学》《中国学术》第1辑,商务印书馆 2000年1月版,第1~11页。

仅得隐之皮貌,未得隐之精神;得隐之地位,未得隐之性情。》[8] (P245) 钟秀对陶渊明异于晋人、一般隐士“独超众类”的“自我”性情评述,洵为的论。陶渊明是魏晋以来文人自觉的集大成者,他有抚无弦琴、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阮籍、王羲之式的名士风流;他挂巾归隐,正因为是隐士,也就成就了他独善其身的“自我”,所以他又有名士们所企慕的文人隐士风流。东晋政局和名士统治的短暂时代,是陶渊明“自我”个性得以酝酿、成长、张扬的沃土与良机。在这方面,稍晚的谢灵运远没有他幸运,谢灵运赶上的是寒族军阀统治的时代,那种名士个性张扬的氛围也就不复存在。所以谢诗比起陶诗来,要内敛得多了,他注重内在的感悟,自我的迹象远没有那么强烈,景物描写也客观化了,成了一种写实的描摹,终于导致写实山水在他笔下的长足兴起。往后的谢朓比起谢灵运来更加内

敛,甚至不得不以牺牲文学为代价(“末篇多蹶”)来苟喘性命;鲍照、江淹也都一个个因“文高见忌”,不敢张扬自我才行,只落得个“才尽”的卑名。因而相比较起来,陶渊明不能不说是个不幸中的幸运者。就算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谪仙人”李白,也有“我独不得出”的苦闷和放金还山的被迫驱逐,所以他最企慕陶渊明的自我风流:“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李白《戏赠郑溧阳》)、“梦见五柳枝,已堪挂马鞭。何日到彭泽,狂歌陶令前。”(李白《寄韦南陵冰……》)陶渊明的这种强烈“自我”的确感染着每个时代,令人羡慕不已,怪不得鲁迅先生说:“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9] (P415)正是就陶渊明的“自我”情性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而感发的。

参考文献:

- [1] 佚名. 莲社高贤传[M]. 汉魏丛书本.
- [2] 王通. 文中子·立命篇[M]. 四部丛刊本.
- [3] 罗宗强.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4] 乔仪. 剑溪说诗[M] / 清诗话续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5] 周振甫. 诗品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6] 陶澍. 诸本序录[M] / 靖节先生集. 北京: 文学古籍刊行

- [7] 社, 1956
- [7] 仪平策. 中国审美文化史: 秦汉魏晋南北朝卷[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
- [8] 北京大学中文系等编. 陶靖节记事诗品[M] / 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9] 鲁迅. 《题未定草》其六[M] / 鲁迅全集.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责任编辑 安正发]

(上接第 10 页)岂取骏爽之群言雕龙也。”刘勰热烈地追求文学的美,当然这是被严格界定了的美,与当下所流行者有着原则的区别。

研究《文心雕龙》早已成为专门之学(“龙学”),乃是学术界的热门,论著极多,在张少康等

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史》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之末,就列出了论文 2900 篇、专著 215 部,笔者也有一本书和若干论文滥竽于其中;但《文心雕龙》研究仍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深入之处,那是需要另行专门加以讨论的了。

参考文献:

- [1] 王元化. 刘勰家世与士庶区别问题[M] / 文心雕龙讲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2]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文坛三户[M] / 鲁迅全集: 第六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3] 顾农. 试论《昭明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J]. 南开学

- 报, 1995 (1).
- [4] 杨明照. 文心雕龙校注拾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5] 兴膳宏. 《文心雕龙》论文集[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4

[责任编辑 安正发]